

天的“博弈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伴随西方200多年经济发展成长起来的经济学,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和借鉴呢?

首先,应该承认建立在私有制、工业化和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其观察问题的视角,其规范研究的对象,以及许多理论,更接近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预期目标,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市场化、民营化和与国际接轨的现实。在微观经济方面、在应用型经济学知识和理论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时间和发展水平上走在了我们前面,而且在经济学方面也走在了我们前面,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成果。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用和创造,西方经济学浩如烟海的成果,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各个国家的产物,更是针对具体研究对象的产物,它们不可能是普遍适用的。

其次,西方经济学对学术规范的强调,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是有巨大贡献的。中国传统经济学的治学方法和论著往往缺少学术规范,将研究创新与宣传教育混在一起,既有不少低水平的重复劳动,又有因概念、研究层面的界定不清而形成的无谓争论。西方经济学不仅强调研究和论著的规范,而且在分析方法、工具和视野等方面也为中国提供了大量新的武器。

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也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今天的诸多市场经济思想和政策是建立在高度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基础之上的,与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市场转型、民主和法治建设的情况相比,相去甚远;即使是早期的,诸如亚当·斯密或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也由于时代不同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今天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正在进行工业化的人口众多且资源匮乏的大国;二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三是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它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和主导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人口和资源的矛盾始终是制约中国发展的最基本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而这些难题西方经济学都没有提供答案。

以上简单的论述,只是想进一步说明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既不能抱残守缺,拘泥于当年苏联创造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而应该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通过吸收各种理论和方法的精华来形成和丰富国史研究理论,以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

## 当代中国文化研究面临的新挑战

重庆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研究员 张凤琦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方法的确定,总是以对对象的认识为前提的。从20世纪初文化学诞生以来,经验方法、结构方法和历史方法是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改革开放以前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上所采取的主要方法。直到文化产业出现,由于人们对文化认知的改变,文化研究方法才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文化产业的兴起,首先使文化的功能得到拓展。文化不仅具有认知功能(或宣教功能)、传播功能、娱乐功能,而且还具有投资功能。投资功能体现为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这也是以往基本被忽略的功能。文化的投资功能,反映了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其次是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扩大,文化的产业属性和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被重新认识,“文化软实力”问题受到学术界和国家领导层的高度重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文化建设既要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又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

如果说“文化产业”得到主流舆论的认可并正式被纳入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范畴,是对文化的重要属性即物质属性认识的纠偏的话,那么,“文化生产力”命题的提出,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sup>①</sup>。文化被作为生产力这一创新理论的提出,使文化生产被正式纳入社会化大生产的范畴。这就使得文化不再仅仅是经济建设的手段和工具,而是直接走向前台,作为生产力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

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随着文化和经济的彼此渗透和高度融合,文化无论是从认知还是从文化内涵乃至文化建设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文化研究中,倘若我们仍然仅限于对文化的表现形式、结构分层、发展轨迹等进行研究,就文化而研究文化;仍然把它单纯作为宣教、传播、娱乐等工具来看待,而无视文化与社会生产高度关联的发展趋势,那么,我们固有的对文化的研究方法和知识结构就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了。可以认为,当今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的发展特征,的确对文化研究工作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挑战之一,来自我们究竟怎样认识“文化生产力”,怎样认识文化在社会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正如文化概念众说纷纭一样,迄今为止,关于文化生产力概念的界定也是见仁见智的。然而,文化生产力的提出,无论是从文化研究还是从经济学立论的角度,都是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创新和突破。文化生产力的提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因为“要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就必须加大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意味着人力资源观的转变;必须增加生产力中的文化要素,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增加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这意味着物质资源消耗减少;必须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这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sup>②</sup>。一言以蔽之,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更加密切,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得到延伸,文化的功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文化生产力的性质、规律、动力、结构和机制,并进而探索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特殊性等问题,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学术界艰巨而重要的任务之一。

挑战之二,随着文化研究领域的扩大,急需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路径

由于文化生产被纳入社会化大生产范畴,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则意味着物质生产的所有手段,如市场配置、市场营销、资源整合、规模化经营、现代企业制度等等,都适合文化产品的生产。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蒙特利尔会议为文化产业下定义时所指出的那样:文化产业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sup>③</sup>。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文化的研究已远非固有的文化学或文化哲学、文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历史学等学科所能囊括,而文化产业这种跨多个学科的边缘学科的崛起,使得管理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必将被运用于文化研究中。因而,文化研究的方法无疑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如何借鉴多学科优势来研究文化问题,抑或探究新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新华网,2004年9月27日。

② 张弛:《“文化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有什么重大意义?》,《北京日报》2009年2月16日。

③ 转引自陈学璞《论十六大对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桂林论丛》2003年第4期。